

论王国维对我国历史档案研究的贡献

■辽宁大学 姚 兰

摘要：王国维是我国 20 世纪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对我国史学、文学、哲学都有十分重要的贡献，尤其在甲骨档案、汉晋木简档案、敦煌文书档案等历史档案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在研究过程中王国维还提出了“二重证据法”这个全新的研究方法，为我国历史文献、历史档案、乃至历史学、考古学研究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关键词：王国维 历史档案 二重证据法

一、王国维简介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庵，又字伯隅，曾号“人间”、“永观”、“礼堂”，晚号“观堂”。王国维早年主要从事哲学和美学研究，著有《红楼梦评论》、《静庵文集》；他还着重研究文艺学和艺术史，著有《曲录》、《人间词话》等名著，对当时文艺界影响很大。后来，王国维主要从事古史研究，在甲骨文、金文、殷周史、汉晋木简、敦煌文书、西北地区古史、蒙元史等方面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果。影响较大的著作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和《殷周制度论》、《古史新证》等。

二、王国维对甲骨档案研究的贡献

王国维在甲骨档案方面的独创贡献在于用甲骨卜辞这种考古发现来探讨和印证商周历史和典章制度。如《殷墟卜辞所见地名考》是王国维依据甲骨卜辞所见地名与古文献相印证而撰写的。王国维对于甲骨档案研究的另外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最先进行了甲骨档案的缀合。由于甲骨经过钻、凿、灼后，每片甲骨都有了裂纹，又在地下埋了近三千年，所以，甲骨档案出土后，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存在程度不同的破裂，使甲骨档案记述不够完整，给甲骨档案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因此，甲骨档案缀合也是甲骨档案研究中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王国维对殷王朝的先公先王考，就是通过甲骨档案的缀合而说明的。

郭沫若就曾对王国维在甲骨档案方面所做的贡献进行过这样的评价：“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①

三、王国维对汉晋木简档案研究的贡献

（一）确定汉长城位置

长城的起讫地，史书都没有明确的记载。斯坦因在敦煌以北的一些烽燧遗址中发现西汉时期的简牍。根据这批材料，斯坦因对汉代长城的位置、走向及构筑方式、烽燧的分布状况、结构和功能、长城与烽燧的修筑年代等问题作了具体分析。王国维同意斯坦因的说法，并根据法显《佛国记》、《晋书·凉武昭

王李玄盛传》和唐人所著《沙州图经》等资料加以补充证明。《沙洲图经》载有古长城正是汉长城旧址，位于敦煌以北，是汉代屯戍之所，也是“由中原通西域之孔道也”。^②王国维最终据此确定汉长城位置。

（二）确定玉门关位置

汉武帝时期，为了保护河西走廊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设置了阳关和玉门两道关卡，作为通向西域的门户。两关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口。但是，玉门关的确切地点，唐代以来就不能明指，史书记载互有歧异，各不相同。斯坦因发现汉晋木简之后，玉门关址问题再度引起争论。敦煌西北之玉门关，则是太初以后所置，因而提出玉门关曾经西迁之说。陈梦家《玉门关与玉门县》^③也提到玉门关西迁之事。王国维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进一步指出，酒泉郡治下的玉门县即为太初以前的玉门关所在地，他还根据上引简文，考定玉门关西迁之年“必在李广利克大宛之后（太初四年），西起亭至盐泽之时”。

四、王国维对敦煌文书研究的贡献

王国维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始于 1909 年协助罗振玉校理刊印《敦煌石室遗书》及翻译斯坦因的《中亚细亚探险记》。1911 年罗、王二氏赴日寓居后，敦煌文献逐渐成为王国维治学的重要对象，算上 1909 年的译文，到 1920 年为止，王国维发表的敦煌写卷专论文章有 30 篇（则），这其中包括唐写本《兔园册府》残卷跋（1913 年秋，据罗氏藏本）、《流沙坠简》序（1914 年春）、《流沙坠简》后序（1914 年 4 月）、唐写本残小说跋（1919 年，据狩野录本）、唐写本敦煌县户籍跋（1919 年，据狩野录本）、宋初写本敦煌户籍跋（1919 年，似亦据狩野录本）、唐写本《字宝》残卷跋（1919 年）、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1920 年）^④等。

五、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及其对历史档案研究的贡献

（一）二重证据法提出的背景

王国维于 1925 年提出二重证据法，一方面，当时正值洋务运动期间，中国知识界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些早期的、带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把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说介绍到中国，传统的乾嘉汉学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先进的史学方法的挑战。另一方面，甲骨文、敦煌遗书、汉晋简牍清朝三大发现也为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提供了文化背景。

（二）二重证据法的内容

1925 年王国维在给学生的讲义《古史新证》中，首次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

基于 Web2.0 的图书馆信息服务应用

■ 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图书馆 钱嘉荔

摘要: Web2.0 是一种创新的服务模式,通过自我服务而服务于“长尾”,应用于各个行业或领域,渗透到全体用户。Web2.0 提供更加人性化的信息服务,使缺少“信息素养”的普通用户能够便利地获取各类信息。这里我们主要以图书馆为例来研究基于 Web2.0 的信息服务应用。

关键词: Web2.0 图书馆 信息服务

1. 引言

Web2.0 浪潮的冲击,给图书馆服务注入了新的诠释,2005 年 9 月美国 Michael Casey 博士在博客中提出图书馆 2.0(Lib2.0)名词后。又于 2006 年 9 月美国《图书馆杂志》撰文

“Library 2.0”指出:“以用户为中心的变革是图书馆 2.0 的核心,这种新的图书馆服务模式鼓励持续和有意识的变化,邀请用户参与建设他们所需要的实体和虚拟服务,并通过始终如一的服务评估予以支持。同时,它也努力吸引新用户,并通过改善现有用户驱动的服务和设施更好地服务于当前用户。”同时也强调:“尽管不是必要的,但技术可以帮助图书馆构建一个用户驱动的 2.0 环境,Web2.0 技术在帮助我们跟上读者需求变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图书馆 2.0 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是 Web2.0 的理念和技术在图书馆行业中的应用,从而构建新的图书馆信息服务。它不仅是一些技术的组合,而且是新的“思考方式”或“运营方式”。

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⑤

这里所说的“纸上之材料”,指的是古今流传的文献典籍。其中包括《尚书》、《诗》、《易》、《五帝德》及《帝系姓》、《春秋》、《左传》与《国语》、《世本》、《竹书纪年》、《战国策》及周秦诸子、《史记》等。“地下之材料”,王国维认为有两种,即甲骨文和金文。^⑥由此来看,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用已有的纸上之材料解释新发现的地下之材料,又以新发现的地下之材料,印证纸上的材料。新发现的材料可以证明古史记载中那些真实可靠的内容;反之,古史记载也可弥补新材料的漏洞,二者互相印证,则可使人们获得更全更真实的史料,使学术研究工作能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二重证据法”作为一种历史的考证方法,实际上是西方资产阶级实证论和中国传统考据方法的有机结合。

(三)二重证据法对历史档案研究的贡献

1. 开创了研究历史档案的全新模式

殷墟甲骨档案发现之前,人们对殷代社会的认识是不清楚的。由于文献不充分,人们一直以来都认为夏殷是“传说中的时代”。直到 1898 年殷墟甲骨发现之后,王国维开始致力于对甲骨、甲骨文字、甲骨档案的研究。王国维在这一研究过程中用出土的甲骨档案、金石档案补证《史记》、《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等书。这一做法突破了以往学者以经证经和在注疏传笺中解决问题的模式,采用近代的科学方法和乾嘉学派的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方法,成功地将地下出土的材料运用于历史制度的系统研究,用实物史料验证和丰富史籍,又反过来用史籍研究这些实物史料,从而获得许多新的认识,开创了一种区别于传统研究方式的新模式。关于二重证据法的发现,陈寅恪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

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家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⑦

2. 加强了人们对历史档案的重视

二重证据法含有科学的辩证思想,比起以前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有了很大的进步。二重证据法提出后,由于其中的“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互印证的观点深入人心,所以人们在重视“纸上之材料”的同时,逐渐加强了对“地下之新材料”的重视。通过历史档案可以使人们更好的了解过去,通过历史档案可以将人们带回到曾经的历史年代,通过历史档案可以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历史档案对与今天的我们来讲,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二重证据法的提出让人们认识到了历史档案的作用也加强了人们对历史档案的重视程度。

参考文献:

- ①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篇》,人民出版社,1982,8
- ②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84,821-822
- ③陈梦家:《玉门关与玉门县》,中华书局,1980,195-204
- ④柴剑虹:《王国维对敦煌写本的早期研究》,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130-135
- ⑤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的最后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2
- ⑥魏建震:《从历史认识论看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中的运用——为纪念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提出80周年而作》,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129-134
- ⑦陈寅恪:《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26 ■